

考據的虛與實

陳鴻森*

梁任公先生在他的《清代學術概論》裏曾經說到，清代學術運動是一種研究法的運動，而不是主義的運動。他說：「清代二百六十餘年之學術，以考證學為中堅。」他認為「無考證學，即無清學」。考證學，清代學者或稱為考據，戴震在文章裡稱為「考覈」，這些都是異名同實。梁任公特別肯定清代學者在考證方法上的客觀性，特別推崇他們的研究方法。我們知道自然科學注重實驗，主要是探索一些未知的知識領域；社會科學重調查，希望通過調查所得，經過統計、分析，試圖發現一些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。而考據學則是文史研究的一個必要手段，考據的目的是要發掘事實，還原真相。經過對史料多方面的收集、歸納和分析，然後再經審慎的辨證，試圖還原歷史真相，或判定是非真偽。清代考證學的本質，我想借用《四庫總目》卷一一九評論顧炎武《日知錄》的一段話來作說明：

炎武學有本原，博瞻而能通貫，每一事必詳其始末，參其證佐，而後筆之書，故引據浩繁，而抵牾者少。

*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教授

用現在流行的說法，這就是乾嘉考證學的典範。考據之要力求每一件事情必詳其始末，取證博瞻，也就是說作到全面占有材料，然後分析條貫事情原委始末，參之以佐證，這樣用歸納例證所得到的結論，自然是牴牾者少。而引據越浩博，材料證據越充分，結論就越見真確，所以清代學者考證往往不避繁瑣。但有史料依據，並不能保證其結論必然為真。朱熹曾經說過：「看文字須如法官深刻，方窮究得盡。」朱熹曾經作過四年同安縣主簿，他經常借判決獄訟來比喻讀書窮理。他曾經說過：「學者觀書，大概病在執著。」學者大多自有定見，不肯放下，正如聽訟，先有主張乙的意思，那便只尋求甲的不是；如果先主張甲的意思，便只見得乙的不是。他的結論說：「不若姑置甲乙之說，徐徐觀之，方能盡其曲直。」也就是說學者不應該預存成見，「徐徐觀之」就是要多方面去蒐證，最重要的是必須經過一個嚴密的辨證過程，確定材料真偽，還有這些材料作為證驗的有效性及適用價值等等。然後根據這些材料的互相聯繫，加以綜合分析，才能得到比較近於正確的論斷。驗證這些材料的真偽，首先就必須通過考據的手段來加以判別。經過這個考證的程序，這些材料作為證驗的有效性能得到進一步的釐清。有些材料真的片言可以折獄，就是那些材料的證驗性相當強，這當然是直接證據。但文史研究往往書缺有間，並不是事事物物都有直接證據；換言之，如果事事都有直接證據，這問題可能也就不存在了。有些材料，雖然可說是直接材料，經常被人們引用作為佐證，這些材料雖然出於當事人的朋友，或其子孫，甚至他本人言之鑿鑿，有的更有實物證據，但即使引用當事人的話或者實物證據，仍不能保證它必然就會導出正確的結論。這就說明史料有它本身的局限性。考證是依據史料而成立的，既然史料有其界限，當然考證也會有它的界限。以下我舉幾個清代學術史上的案例來作說明。

我們談考據的虛與實，首先我們從「實」的方面來說，也就是片言折獄的例子。清代公羊學家宋翔鳳的生卒年歲，歷來有幾種說法：《清史列傳》、《清史稿》本傳說他咸豐十年卒，年八十二；陸心源《三續疑年錄》、《清儒學案》、姜亮夫《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》說他「卒年八十五」；支偉成《清代樸學大師列傳》、蔡冠洛《清代七百名人傳》作「卒年八十七」。也就是他的年歲有八十二、八十五、八十七三種說法。他卒于咸豐十年，歷來並無異說，但因為各家所記年歲既然不同，他的生年當然也就不同。一般學者都根據姜亮夫《歷代人物年里

碑傳綜表》，認為他咸豐十年（1860）卒，年八十五，則宋翔鳳應該生于乾隆四十一年，就是1776年。劉逢祿也生于乾隆四十一年，那麼宋翔鳳跟劉逢祿是同年生的。而《清史稿》和《清史列傳》卒年八十二之說，他應生于乾隆四十四年（1779）。我們知道傳記材料經常存在著承襲性，傳記材料不能憑空杜撰，往往陳陳相因。特別是一些著名學者所作的碑誌或傳記一旦有誤，後來的著作，即使是正史，往往也隨之而誤。但宋翔鳳的詩集《洞簫樓詩紀》和《憶山堂詩錄》是有編年的。《洞簫樓詩紀》卷十三有一首詩，題目是〈哭外兄劉申受禮部逢祿〉，其中兩句說：「一歲長余同寂寞，千秋待子忽淪亡。」我們從這首詩可以知道宋翔鳳其實比劉逢祿小一歲。而根據劉逢祿的兒子劉承寬所作〈先府君行述〉，劉逢祿生于乾隆四十一年六月，毫無疑問的，宋翔鳳應該生於乾隆四十二年（1777）。他的詩集另有一首道光二年（1822）所作〈別幼頤四首〉（幼頤是他的小妹），首句說：「四十將過六，久更風與霜。」1822年年四十六，經過推算，他確實生於乾隆四十二年。宋翔鳳卒於咸豐十年，所以正確的年齡應該是年八十四。前面提到的八十二、八十五、八十七三種說法都是錯誤的。這是當事人有明文作為依據，比起其它傳記材料或間接史料當然更為可靠。但文史研究往往欠缺的就是當事人的說法，所以我們只能尋求旁證，尋求間接證據，甚至有時候只是一些合理的推想。缺乏當事人的說法，最可靠的是從他的子孫或友人的記載來取證，或者從同時代人的記載中來推考。但這些記載往往互異，即使是友朋的話，有時也未必可靠。我們舉《漢學師承記》的例子來作說明。

江藩《漢學師承記》卷六〈任大椿傳〉，提到任大椿著有《字林考逸》八卷，但下文又說：

同時有歸安丁小雅名杰者，謂曾著《字林考逸》一書，稿本存子田處，子田竊其書而署其名，作書遍告同人，一時傳以為笑。然子田似非竊人書者。

「子田」是任大椿的字，任氏是乾嘉時期著名的學者，長於三禮和小學，他跟邵晉涵、王念孫、阮元這些學者極為友好，是揚州地區出身的小學名家。我們知道《字林》是晉代呂忱所撰的一本小學名著，它上承《說文》之緒，下開《玉篇》之先聲，這本書大約亡於宋元之際。

《字林考逸》，顧名思義就是從群書裏蒐集輯錄《字林》的佚文材料，然後根據《說文》部目將它排纂成書。眾所周知，乾嘉學術的一個特色就是「家家許鄭」。《字林》一方面補充了《說文》以外的魏晉新體字，另方面則繼承了《說文》原先的說法。因此，清代學者在研究《說文》時，經常引用《字林》來印證許慎《說文》。任大椿曾經參與纂修《四庫全書》，阮元曾說《四庫提要》小學類大多數提要出自任大椿之手。我輯錄阮元佚文有一、兩百篇，其中有一封阮元寫給朋友的信，沒有署受信人之名，我推測應該是給焦循的信。阮元信中說到揚州、鎮江地區出身的學者，以王念孫、段玉裁、汪中、劉台拱、任大椿這五個人學問為最優。《字林考逸》則是任大椿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，可是江藩《漢學師承記》卻說這本書是丁杰所作，任大椿是竊其書而自署名。丁杰心有不甘，於是寫信遍告諸友，一時傳以為笑。雖然江藩在文末加了一句「然子田似非竊人書者」，此舉最不足為訓，江藩一方面可免誹謗之責，另方面又達到了散播謠傳的目的，所謂「俗說不實，流為丹青」。如果江藩本人並不認為任大椿《字林考逸》為竊人之書，則根本不應在任大椿傳中記載此事。江藩和任大椿同是揚州地區的代表性學者；江藩所提到的丁小雅，也就是丁杰，是乾嘉時代著名的小學和校勘學家，尤長於《大戴禮》。其校勘之學積功甚深，當時與盧文弨齊名，翁方綱參與纂修《四庫全書》，頗得丁杰之助。可惜丁杰身後零落，文集和所著各書幾乎都不傳於世。剛剛提到丁杰以小學、校勘名世，他跟任大椿確實是好友。江藩《漢學師承記》刊行後流布甚廣，於是任大椿就成了郭象盜竊向秀《莊子注》一類的嫌疑犯。任大椿死於乾隆五十四年，江藩《漢學師承記》出版於嘉慶二十三年，任大椿已死去多年，當然無法起九原之下為自己辯白，《字林考逸》的作者問題便成了一項公案。民國初年，章太炎一位學生支偉成寫了一本《清代樸學大師列傳》，他提出了一個調和論的說法：

《考逸》有傳為丁小雅作而遭先生剽竊者，當係各輯此書，文人相輕，藉成隙末。此與戴（震）、趙（一清）兩家《水經》同一疑案，要非事實耳。

他認為此事應該是任大椿、丁杰各自輯有《字林考逸》之書，因為文人相輕，所以成為齟齬。這種調和論保全了兩方聲名，其實是把真相掩蓋掉了。支偉成這個說法並無其他佐證，我們

看不到並世學者曾提到任大椿、丁杰各自輯有《字林考逸》之書，這只是支偉成個人的臆測杜撰之說。我們剛才說到，任大椿早卒，不可能為自己辯白，問題的解決關鍵還是必須從任大椿跟丁杰兩人共同的朋友來考察。翁方綱是兩人共同的朋友，他曾經為丁杰作傳，《復初齋文集》中有一篇〈丁小正傳〉。翁方綱的《經義考補正》，原稿即成於丁杰之手。翁方綱所纂《四庫提要》稿，其中頗多出於丁杰和盧文弨等人代校。翁方綱為丁杰作傳，詳細列舉了他的著作，其中並未提到丁杰著有《字林考逸》一書。反而是翁方綱曾經為任大椿的《字林考逸》作序，他極稱讚任大椿用力之勤、編次之當。另外，阮元也是這兩個人共同的朋友，阮元乾隆末年入京，頗從邵晉涵、王念孫、任大椿三人遊處。阮元同時為任大椿、丁杰兩人寫過傳。在任大椿傳裏，他很明白的談到任大椿著有《字林考逸》，而且還為這書寫了序。可是阮元在丁杰傳裏卻無一字談到丁杰作過《字林考逸》。任大椿、丁杰兩人共同的朋友所作的傳記，還有書序，應該是很有力的旁證，也就是這本書其實是任大椿作的。可是旁證終究還是旁證，還不能作為絕對證據。《章學誠遺書》卷十八有一篇任大椿的傳，章氏記到：

乙未，余復至京師，君已徵為四庫書館纂修。……校理之暇，借窺中秘儲藏，四方奏上遺書，人間所希觀者，從而證定向所業編，得以益信。余訪君，屬疾，延見臥所，則君方輯呂忱《字林》，佚文散見，蒐獵橫博，楮墨紛拏，狼藉枕席間。君呻吟謂病不可堪，賴此消長日耳。

章學誠談到他乾隆四十年這年到京師，有一天他走訪任大椿，剛好任氏生病。他進到任大椿臥室，看到他正在排纂《字林》，佚文散見，「狼藉枕席間」。章學誠這段記載是他親目所見，當然是強而有力的證據。但這個材料是否可靠，我們也必須加以檢證。我們知道章學誠卒于嘉慶六年，江藩《師承記》刊于嘉慶二十三年。在江藩《師承記》刊布之前，我們沒有看到任何有關任大椿竊人之書的說法，這個說法始見於江藩《漢學師承記》。既然章學誠親眼目睹任大椿纂輯《字林》的佚文材料「狼藉枕席間」，而章學誠死在江藩成書之前，顯然章學誠並非預先要為任大椿辯誣，所以章氏〈任幼植傳〉就可以作為《字林考逸》是任大椿所著很有

力的證據。但更直接的證據是，任大椿《字林考逸》完成後，曾經就正于丁杰，丁杰還為他補了幾條失輯的佚文，這些佚文附刻在《字林考逸》書後。丁杰為任大椿補輯的佚文，加上章學誠親目所見，這兩重證據應該可以粉碎江藩《漢學師承記》任大椿剽竊丁杰著作之誣。這是考據材料在徵實方面的運用。

考據「實」的一面，大家比較容易理解，因為考據材料與當事人關係越密切，它的證驗性就越大。友人之說當然重要，但並非全然可靠，像江藩這樣的損友，往往成為事件的爭端。同時代的友朋之說不皆可靠，我想盡人皆知，但即使當事人兒孫的話，也未必完全可靠。我舉一個錢大昕的例子。錢大昕著有《十駕齋養新錄》二十卷，這本書是清代考證學不朽的名著。錢氏除了《養新錄》之外，另有《養新餘錄》三卷。《養新餘錄》後面有錢大昕之子錢東塾所作的跋。錢東塾〈養新餘錄跋〉說：

《養新錄》二十卷，成書最後，甫脫稿即為阮中丞芸臺先生攜去，釀金開雕。以後續有所得，別記一編，名曰《養新餘錄》。逮甲子（嘉慶九年）冬捐館，共得若干條。……念及《養新餘錄》未刊，終為全書缺事。爰取手稿繕錄清本，分為三卷，以授梓人。

錢東塾說《養新錄》成書後，阮元「攜去，釀金開雕。以後續有所得，別記一編，名曰《養新餘錄》」。《餘錄》成于《養新錄》之後，是天經地義的事，錢大昕之曾孫錢慶曾在《竹汀居士年譜續編》嘉慶八年條記：「十二月，始刊《養新錄》手定本，凡二十卷。後所得為《養新餘錄》三卷。」《年譜續編》嘉慶四年條說《養新錄》於嘉慶四年編成，則成書後到嘉慶八年冬才付刻。因此錢大昕嘉慶四年以後「別有所得」，所記的一些新見，在他死後手稿被編為《餘錄》。錢大昕卒於嘉慶九年十月，那麼《餘錄》的撰著，應該在嘉慶四年到九年十月之間。我曾輯錄了錢大昕潛研堂遺文，大約一百七十幾篇，這些佚文有不少題跋，是錢大昕向當時蘇州一帶著名藏書家黃丕烈等借讀，都是一些比較罕見的書，在歸還時，這些藏書家通常都會請他撰寫題跋，談談這書的價值。這些題跋都有具體的年月。我把這些題跋和《養新錄》作比對，發覺不少條目的字和題跋完全相同，或者基本文意相同，而這些題跋很多都是嘉慶五年以後所寫。既然《養新錄》成書于嘉慶四年，為什麼書中會出現一些他嘉慶五年以後才看

到的書？其中有一條特別顯著的例子是《養新錄》卷十五「石刻詩經殘本」條，所記為後蜀石經《毛詩》殘本。這個殘本是他向黃丕烈借的。黃丕烈買到這殘本有具體的年代，段玉裁《經韻樓集》卷一〈跋黃蕘圃蜀石經毛詩殘本〉、陳鱣《簡莊文鈔續編》卷一〈蜀石經毛詩考異敘〉都提到黃丕烈買得蜀石經《毛詩》殘本在嘉慶九年，也就是錢大昕死的這年。所以《竹汀年譜續編》雖說《養新錄》在嘉慶八年十二月付刻，但《養新錄》所記到的下限是嘉慶九年，而錢大昕卒於九年十月，這說明錢大昕《養新錄》雖然於嘉慶四年編成，而他嘉慶五年、六年、七年、八年、九年讀書所得，還是不斷增入《養新錄》中。既然如此，他就沒有再另寫一本《餘錄》的必要性，這是第一點。其次，按照錢東塾的說法，《養新餘錄》所記各條，應該是錢大昕晚年讀書所得的新見。我將《養新餘錄》通檢一遍，發現其中許多條目之說，在錢大昕其他著作裏已經提到，並不是什麼晚年新見。也有一些條目之說，雖然不見於錢大昕本人著作，但在他的朋友盧文弨等人著作裏已有相同之說。盧氏卒於乾隆六十年，所以斷斷不能說錢大昕晚年才有《餘錄》這些新見，這是第二點。再者，《養新餘錄》裏面一些條目只是鈔錄成文，錢大昕並沒有另作引申和議論，這些條目並沒有太大的學術意涵，只是鈔錄一些文字材料，以備考索，如卷中最後一條「齊楚浙三黨」，不過節錄《明史》之文而已，這是第三點。更重要的是《養新餘錄》有些條目和《養新錄》或《文集》裏的說法是互相牴牾的。經過我的考證，凡是這些矛盾不一的地方，都是《養新餘錄》錯，《養新錄》或《文集》對。我們不好說錢大昕晚年昏瞶，盡記一些錯誤的，因此，結論很清楚：《養新餘錄》其實是錢大昕編《養新錄》時所刪賸的材料。因為有些意見已經見於錢大昕本人其他著作，或已見於同時人的著作，有些只是鈔錄成文，並非什麼學術創見，也就沒有必要編入。另外有些條目則是他後來有新的看法，修正前說，所以將它刪棄。錢氏後人寶愛先人遺澤，把這些他已刪棄的材料又輯錄成書。有些學者不曉得《餘錄》是錢大昕刪棄的材料，反而引用《餘錄》之說，責怪錢大昕自相矛盾。幸好錢大昕這些題跋有具體的年月，可以很有力地決嫌疑、辨是非。我有一篇〈錢大昕《養新餘錄》考辨〉，發表在《史語所集刊》，我看到最近陳祖武先生《乾嘉學術編年》已經引用了我的說法。子孫所記未必可靠，我想這並不難理解，因為父

祖的學行，子孫由於年紀差異，未必完全理解。

接下來要講的是有些學者，即使是著名學者，在講述自己的事跡時，本人現身說法應該是最可靠的，其實不然。《清史列傳》卷六十九〈李銳傳〉載：

李銳，字尚之，江蘇元和人。諸生。篤學樸厚，長於經義，習《公羊春秋》、《虞氏易》。嘗著《周易虞氏略例》十八篇為一卷。……儀徵阮元督學浙江，延銳校《禮記正義》及輯《疇人傳》，元以今之敬齋稱之。……嘉慶二十二年卒，年四十五。

李銳是乾嘉時期著名的數學家，錢大昕弟子。《清史列傳》這短短的一段話，其實有不少錯誤。第一是李銳生於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，卒於嘉慶二十二年，卒年應該是五十歲，傳中作四十五是錯的。其次，史傳說阮元任浙江學政時，延請李銳校勘《禮記正義》及纂輯《疇人傳》。其實阮元請李銳分纂《十三經校勘記》，是在嘉慶六年阮元任浙江巡撫時，並非提督學政時，阮元任浙江學政是在乾隆六十年秋，嘉慶三年九月任滿還都。這是年代的錯誤。更重要的是史傳說李銳分纂《禮記校勘記》，其實《禮記注疏》是洪震煊（浙江台州人）所校，並不是李銳。《清史列傳》卷六十九〈洪震煊傳〉說：「元修《十三經校勘記》，震煊任《小戴記》。」此處不誤。但〈李銳傳〉這個錯誤其實來自阮元本人。阮元《擘經室二集》卷四〈李尚之傳〉說：

元昔在浙，延君至西湖，校《禮記正義》。予所輯《疇人傳》，亦與君共商榷，君之力為多。

顯然《清史列傳》的記載是本於阮元為李銳所寫的傳，阮元自己說他請李銳參與《禮記校勘記》的分纂工作。《十三經校勘記》那一經是誰校的，在《校勘記》的序裏寫得很清楚。李銳所校，其實是《周易注疏》、《穀梁注疏》和《孟子注疏》三部。《十三經校勘記》是阮元主修的一部名著，各經由誰分纂，序文裏都有明文記載。李銳曾參與《經籍纂詁》的分纂工作，《疇人傳》主要也是成於李銳之手。李銳從阮元遊處多年，其分纂那幾經《校勘記》，按理阮元是不會弄錯，可是他在為故人作傳時偏偏誤記了。由於是阮元作的傳，這傳收在阮元《擘經室

集》裡，所以史傳，還有一些學者就沿用這一說法，不覺其誤。可見，即使是當事人言及本身事跡時，按理可視為直接證據，可是由於記憶的失誤，便會產生事實的誤差。這一類誤差我們還可以根據其他旁證來加以訂正。我在編纂一些學者年譜時，經常可以發現這一類作者記載的錯誤。但有些當事人的說法，未必是誤記，可能是有意的歪曲，這種情況，我們就很容易會被誤導。我舉個例子，戴震《東原文集》卷三裏面，有一封〈與王內翰論學書〉，是給王鳴盛的信。這封信的內容是戴東原根據一些訓詁材料推論《尚書·堯典》「光被四表」，漢代《尚書》古本「光被」應該本作「橫被」。王鳴盛當時正著《尚書後案》，曾與戴氏論及〈堯典〉。戴東原後來特別寫了這封信與王鳴盛討論古本《尚書》「光被四表」到底作「光」還是作「橫」。王鳴盛《蛾術編》卷四有「光被」一條、談到這件事卻說：

新安戴吉士震，號為精于經。乙亥歲（乾隆廿八年），予官京師，作《尚書後案》。

吉士偶過予，為予論〈堯典〉「光被四表」，「光」當作「橫」，予未敢信。其文集出，內有與予札云云……。三十餘年前，予雖與吉士往返，曾未出鄙著相質，吉士從未以札見投，突見于其集。……

他特別把戴東原這封信錄了下來。根據王鳴盛的說法，他說：我三十餘年前，雖然與戴震有來往，可是從未出鄙著相質，而戴震也從未給我寫過信；現在他的文集卻突然出現這樣一封信……。王鳴盛甚至在《蛾術編》裏暗示戴東原捏造事實，認為這事完全虛構，子虛烏有。王鳴盛《蛾術編》成於晚年，身後才付刻。戴震死于乾隆四十二年五月，而王鳴盛是嘉慶二年死的，也就是說王鳴盛寫《蛾術編》時，戴東原已經死了十幾年。後來學者都相信《蛾術編》之說，認為戴東原當時雖然寫了這封信，實際上並沒有寄出。戴東原死後，他的姻親孔繼涵幫他刻《文集》，把這封信收進去，《東原文集》刊行後，王鳴盛才首度看到戴震這封信。這個說法出於王鳴盛本人的陳述。從道理上來講，我寫了一封信和誰討論學術問題，因為種種緣故，這信最後並沒有寄出，但這信裡討論的問題還是很重要的，因此後來將它收入文集，這在事理上是完全可能的。另外一方面，王鳴盛與戴東原，確實不像錢大昕跟戴震那

樣意氣相投。我輯錄的王鳴盛佚文大概有八十篇，並沒有發現他們深入交往的證據。王鳴盛在戴震生前並沒有看到這封信，幾乎已成定說，沒有人懷疑過。但仔細檢視，這裏面是存在一個破綻。按照王鳴盛的說法，他是看到《東原文集》以後，才首度看到戴震跟他討論「光被四表」這封信。如果這個說法是真實的話，那《蛾術編》所錄這封信文字應該跟《東原文集》是相同的。但是，《東原文集》的版本有兩個系統，一個是乾隆四十三年他的姻家孔繼涵所刻的微波榭十卷本，《東原文集》這是第一次出版。乾隆五十七年，段玉裁把他手邊留存的戴氏文稿為十卷本所未收者，重加編排，即經韻樓所刻的十二卷本。日本有位學者近藤光男先生，是吉川幸次郎先生的學生，他首先比對《蛾術編》所錄的這封信，發現文字和《文集》並不完全相同。這不同處，是不是王鳴盛在引述時擅改的？但我們立刻會推翻這種想法，因為王昶所編的《湖海文傳》也收了這封信，其文字跟《蛾術編》相近，但不完全相同，和《文集》則差異稍大。這顯示王鳴盛《蛾術編》所錄戴東原的信，並非出於王氏擅改，因為有王昶所收的那封信作為佐證，我們可以推定《蛾術編》那封信並非如王鳴盛所說，是從《東原文集》逐錄的。如果從《文集》逐錄，文字應該相同。《蛾術編》所錄應該是王鳴盛從戴震原札逐錄的，王鳴盛應該看過這封信，所以他說「從未以札見投」，這話未可輕信。以上是近藤光男先生的推測，我想他的說法應該可以成立。我相信《蛾術編》根據的應該是戴東原的原札。這封信具有非常關鍵性的意義，是討論乾嘉學術吳派和戴派（我不用「皖派」這個名詞）二者的差異很重要的一封信，在這信裡戴東原隱然發現「因聲求義」這個徑路。戴東原對他這個發現大概相當自負的，所以他把這信寫錄幾份傳示他的朋友。王昶所根據的應該是東原寫錄之本，不過在傳錄時有些改動。《東原文集》這封討論「光被四表」的信，後面附記錢大昕、姚鼐各舉一例以證成東原之說。很顯然的，戴震也把這封信寫錄傳示姚鼐、錢大昕他們，因此他們從《後漢書·馮異傳》和班固〈西都賦〉有「橫被四表」、「橫被六合」之語，可以證實東原所推測的古本《尚書》「光被」必有作「橫被」之本，並非懸想無根之談。今本《東原文集》裏的這封信應該不是它的原貌，我推測它應該是戴東原最後改定之本。這裡有一個問題，你可能會反問：為什麼王鳴盛要歪曲這個事實？從事學術研究，提出問題是很重要的，我們判定一件事情是錯誤的，可以舉一些證據來論斷它的錯。但一個真正的研究

者，可能要認真推考的是為什麼他會那樣想？他何以會致誤？這才是問題的原點。我們同樣要問：王鳴盛為什麼要扭曲事實？這當然只是推測，沒有辦法實證。我想戴東原給王鳴盛寫這封信的時候，王鳴盛未必相信其說，但也無法具體舉證駁議其非。戴氏死後，《東原文集》收了這封信，流布甚廣。王鳴盛後來學問日深，他發現戴東原的說法未必完全可靠，他並不認為戴震這個說法是對的，因此就在《蛾術編》裏特別舉證加以反駁。王鳴盛寫《蛾術編》時，已經完成了《十七史商榷》、《尚書後案》等著作，在當時應該算是吳派最著名的學者。因為王鳴盛的反駁不是在戴震生前，而是在戴震身後，所以王鳴盛詭稱：在東原生前，他並沒有收到這封信，所以當時未及反駁。這種微妙心理，只可意會。這個例子顯示，即使當事人的說法，未必就是絕對證據，可以完全憑信。

下面我舉一個和戴震、段玉裁有關的例子。乾隆五十七年段玉裁重刻《東原文集》，《文集》卷六有一篇〈記洞過水〉的文章。但段玉裁自己的《經韻樓集》卷七也有一篇〈記洞過水〉，篇題下記「代壽陽令龔導江作」。這兩篇〈記洞過水〉文字完全相同，這就出現一個問題，此文作者到底是戴震還是段玉裁？過去學者對此並無定論。劉盼遂在編《段玉裁年譜》時就說：「未知段作或戴作」，他不能確定此文究竟是誰作的。近年學者編纂《戴震全書》，安徽大學楊應芹教授連續寫了幾篇文章，他認為此文的作者應該是段玉裁，而且說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段玉裁這篇文章的底稿，上面還有戴東原的批語，在批語裏，東原高度稱讚段玉裁之文，可見此文為段玉裁所作無疑。九十年代末期，大陸出版了《戴震全書》（張岱年主編）和《戴震全集》（清華大學出版社）兩部戴震著作彙編。《戴震全書》裏的《東原文集》就是由楊應芹教授整理的，他斷然地把〈記洞過水〉刪掉，因為他堅信這篇文章是段玉裁所作，有段玉裁的稿本、戴震的批語為證，所以毅然將它刪去。而另一本《戴震全集》，《文集》中倒是保留了這一篇，可是在第六冊《補遺》裏，整理者也提到北大圖書館那個稿本，他認同楊應芹的說法，認為〈記洞過水〉一文應該是段玉裁所寫。這兩本書是近年來中國整理戴震著作最完整、最新的成果，二者一致認為〈記洞過水〉是段氏所作，楊應芹的說法似乎已成定論。但這立刻會面對一個問題：既然《東原文集》是段玉裁所刻，那有弟子校刻先生文集，

卻將自己文章刻入先生文集裡？沒有這樣的道理，這是第一點。第二點，段玉裁晚年曾經為戴震編過年譜，這是一個很好的風範。那時他已經年近八十，八十歲的老人記憶往往有誤。《東原年譜》乾隆三十五年條載：「是年（《文集》是三十四年，《年譜》繫三十五年）有代壽陽令龔君導江作〈記洞過水〉一篇。」既然段玉裁在編先生年譜時也認為這篇文章是戴東原所作，而且明確指實是代替壽陽縣令龔導江作，那麼這篇文章為東原所作應該毫無疑義。但楊應芹為什麼會堅信是段玉裁所作？因為北大圖書館藏的〈記洞過水〉稿本確實是段玉裁的筆跡，上面也的確有戴東原修改潤色的文字，並且文末還有一段戴東原的尾評：

辭意清婉，味之不盡，為增入考覈，更覺於讀史有會心，善補古人之缺。中間清濁不相入，利民有遲速，及名之隱顯，皆與人品、施政、學問相關，非尋常筆墨事，入志書中，洵傑作也。

這段話是戴東原的總評。「辭意清婉，味之不盡」，當然是東原稱許這篇文章的話，絕非自誇之辭。我們玩味東原為「增入考覈」這幾句話，戴震是說我為它增加了一些考證性的文字，讓別人讀來更覺「讀史有會心」，並且「善補古人之缺」。那麼，我們可以斷定〈記洞過水〉絕非戴震所作，戴震不過是為它增加了一些考證性的文字。所以楊應芹教授才會認為這篇文章的作者應該是段玉裁，而底稿也確實是段玉裁的手筆。那要怎麼解決我剛剛質疑的那兩個問題？這文章底稿確實是段玉裁手筆，而文章也確實不可能是戴震所寫；那段玉裁校刻先生文集，何以將自己文章纂入，而且還捏造事實在《年譜》中說某年先生為某人寫了這篇文章，這顯然是有意造假。對此，楊應芹先生有一番辯解。他說：

今檢其底稿（北京大學圖書館藏），原文作者當為段玉裁，而詳加評改的文字卻是戴震的手筆。其評語一方面說明增改的原因，一方面又極高地贊揚此文的寓意布局。戴氏對玉裁的賞識厚愛，由此可見。玉裁大概出於對先生的感激之情，在重編《東原文集》時便將此文收入卷六，並於《年譜》中加以說明。後人不知個中情由，而文章又是玉裁的手稿，於是又收入他的文集中。

這個辯解很牽強，當然我很羨慕，也很希望我以後有這樣的弟子，只要我讚揚他們的作品，他們就會把好文章編入我的文集。（笑）我想各位當然不會相信這樣的辯解。我首先要強調的是，沒有人會因為感戴師德就將自己的文章冒為先生之作，編入先生文集，然後又在年譜中虛構事實。這就情理來說，我覺得不可能。楊教授寫了幾篇文章論及此事，內容大體相同，他一直在修改這個說法。這裡所引，是他〈東原年譜補正〉的說法，這文章較後出，看來是比較完密的說法。當初我看到他的文章，實在難以苟同，但當時未能看到北大的稿本，所以無法具體評斷這個是非，但我絕不相信這樣的辯解。段玉裁並非無名之輩，他沒有必要為感戴師德便在先生《年譜》中捏造事實。後來我看到《戴震全書》和《戴震全集》，二者都把北大所藏的段氏底稿收進書中。我讀了之後，不禁啞然失笑。楊應芹所說的戴東原的評語是對段玉裁的賞識厚愛，其實完全不是那回事，這是楊應芹教授不曉得這些評語的性質。我們知道宋以後學習為文者有所謂評點之學，古人作文各有義法，戴東原在這底本上的批語，實際上是對這篇文章的命意、結構、布局作了一些具體的提示和分析。評點者藉由圈點、品評、夾批、眉批等形式，對文章的布局、筆法、文句等，加以重點提示，讓讀者更容易尋解，另一方面則是為後學作文示以門徑軌轍。這種風氣到明代達到極盛，在清代還是頗為盛行。戴東原一向以文章自負，他喜歡評點古籍，在段玉裁編的《東原年譜》譜後有相關的記載。他很喜歡評點《史記》，評其結構、用意和用筆之妙。東原在這個底本所作的眉批、夾批，還有尾評，一共有十三條。我們仔細玩味這些批語，毫無證據可以顯示這篇文章是段玉裁所作，反而有幾處批語適足以反證它絕非段玉裁之作。東原在此文第三段之末眉批「以寓意住」，第六段之末批「又以寓意住」。意思是說，這篇文章寫到這裡，用寓意的寫法作為一個段落。還有第四段有一處眉批：「見壽水之大，可為五水之一。」如果根據楊教授的說法，〈記洞過水〉既然是段氏所寫，段玉裁對自己文章的文勢、寓意和筆法，應該最了然於胸，那需評點者來告訴原作者說：此處以寓意作一收束。單憑這一點，便足以顯示〈記洞過水〉絕非段玉裁所作。這篇文章既然不是戴東原作，也不是段玉裁寫的，那到底是誰作的？根據我的研究，原作者其實正是龔導江。原來乾隆三十四年這年，段玉裁三十五歲，戴震四十七歲，這一年他

們到北京應試，兩個人都落榜。段玉裁因仰慕東原之學，他們正式以師弟相稱。戴震以地理之學知名於時，會試落第後，應山西布政史朱珪之聘赴山西，客朱珪幕，段玉裁同往山西，主講壽陽書院。秋冬之際，段玉裁回到京師，第二年三月由吏部詮選，授貴州玉屏縣令，不久就到貴州去了。他們師徒真正聚處時間並不長。段氏在壽陽時，壽陽縣令龔導江修《壽陽縣志》。因戴東原以地理之學聞名，因此龔導江透過段玉裁將《壽陽志》稿本請戴震審定。這《壽陽縣志》臺北故宮藏有一部，北大圖書館也藏有一部。《壽陽志》卷九〈藝文志〉這一門，有一篇龔導江寫的〈記洞過水〉。原來龔導江在修《壽陽志》時，將自己寫的〈記洞過水〉收入《縣志》中。戴震在審定《壽陽志》時，看到這篇文章，很喜歡此文寓意深遠，東原有意為之潤飾，但縣令所修的書，戴東原不便在原來的書稿上隨意增改，就請段玉裁抄了一個清本。戴東原有考證癖，且精於地理之學，因此頗為它增加了一些考證性文字。我們前面提到戴東原的尾評，他很得意地說，我為它增入了考覈文字，便覺「讀史有會心，善補古人之缺」，這顯然是針對第三者而言，不可能是對段玉裁的說詞。我們看尾評中說：「中間清濁不相入，利民有遲速，及名之隱顯，皆與人品、施政、學問相關」，段玉裁當時未任官，不可能施政，這自然指的是壽陽縣令。他說這篇文章「非尋常筆墨事，入志書中，洵傑作也」，顯然這篇文章原先收於《壽陽志》。此文既是龔導江原作，為什麼段玉裁會認為是戴東原代作？原來〈記洞過水〉龔導江原文 488 字，經戴東原這麼一改，增加了 408 字，幾乎一倍。今本《壽陽志》裏所收的〈記洞過水〉，和《東原文集》相較，文字還是有一些出入，顯然龔導江並未完全依照東原所改。根據底稿尾評，戴東原對這篇他增改過的文章大概頗為滿意，所以段玉裁在刻《東原文集》時，就把這篇文章收入了，反正有 408 字是出自戴東原手筆，似乎也不算剽竊。當然段玉裁有點隱諱其詞，說成「代壽陽令龔導江作〈記洞過水〉」。其實不是代作，而是幫他修改潤色，但說成「代作」，作者就轉了一個人。若不是有這底稿出現，我們就會被段玉裁這話所誤導。但這篇文章怎麼又會收入段氏文集？我們前面提到，戴東原當然不便直接在《壽陽志》〈記洞過水〉原稿上大加增改，所以請段玉裁將此文抄寫一篇。戴東原增改、評點就在段玉裁抄寫之本上。這評點之文本來是給段玉裁看的，段氏當然不好把這評點之文直接交給龔導江，他自然是將戴東原增改之文工工整整謄寫一篇再交予龔氏，於是戴東原批改的底稿

就留在段玉裁家。段氏死後，龔自珍等人在編纂段氏文集時，一看是段玉裁的筆跡，就將它收入段氏文集。周中孚《鄭堂讀書記》曾提到此事，段氏文集刊行後，周中孚寫了一封信給龔麗正（自珍之父），說這篇〈記洞過水〉不是段玉裁之作，不應收入。但龔自珍他們不信，因為底稿確實是段玉裁手筆。這就是戴、段兩家文集都有這篇〈記洞過水〉的原委始末。從這個例子我們看到文史研究，考據的程序是必要的，不通過考據，很難發現事實真相。但我們也看到考據「虛」的一面，就是考證依據的是文獻材料，但材料本身有它的條件性。如果材料記載不實，我們就會被它誤導。像段玉裁在《年譜》裏寫乾隆三十五年東原代龔導江寫〈記洞過水〉一篇，完全沒有提到此文原作者是龔導江，甚至將龔導江之文編入《東原文集》。如果不是北大這個稿本出現，我們只能相信《東原年譜》，認為此文是戴東原代龔導江所作，那原作者就被抹煞了。

我們剛才談到，考據的目的是發掘事實，還原真相。考證所依據的是文獻材料，我們前面舉的幾個例子，有些材料確實可以片言折獄，但當事人的說法並不就是確鑿的證據，材料真實並不能保證必然得到正確的結論，問題的關鍵首先是對材料的解讀。我們前面引到《四庫總目》評《日知錄》的話說「博瞻而能通貫」，如果不能博瞻，不能通貫，你不明白北大稿本上那些批語是古人的評點，即使是實物證據，同樣會引出錯誤的結論。考證的第一信條是言必有據，但文獻材料往往言者另有隱情或記憶失誤，那再多的「有據」也不能保證結論之真，這是考據的界限。如何超越這個界限，才是真正的學問。

本文為作者二〇〇六年十月十六日應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之邀，在《清華講堂》所作的專題講演，由清華歷史所研究生張德付君記錄成稿。現經作者同意，特在本刊轉載。

